



仁斋问道

| 对历史与未来的沉思

徐汝芳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仁斋问道

——对历史与未来的沉思

徐汝芳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仁斋问道：对历史与未来的沉思/徐汝芳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348 - 3005 - 1

I. 仁… II. 徐… III. 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文集 IV. D6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400 号

责任编辑：孙宝瑞

责任校对：张恩岭 高 松

出版 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已逾 30 周年的祖国，亦以此期盼再过 30 年，我们的国家能在政治体制上转型成功，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迈上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民主法治轨道。

孙立群著

自序

我的书斋有两个名，一名“仁斋”，又名“广居斋”。两书斋名同源于孟子“居天下之广居”一句话。“广居”之意朱熹解释为仁，把孟子这句话译成现代语，就是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的意思。依此，我的书斋名虽异，其意实一也。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仁”都是其思想的核心。《论语》12700字，讲到“仁”的有一百余处，含义多属道德层面。孟子继承孔子这一思想，并赋予其更丰富的内容。紧接着“居天下之广居”，孟子继续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孟子心目中，“大丈夫”、“君子”，都应该具有上述品德。孟子这段话可谓意境高远，历史上不少仁人志士皆以其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我以之为书斋名，用意正在自励自勉。

孟子在继承孔子道德之仁的同时，还将其发扬光大，提出了更为深刻的“仁政”主张。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谁能说范仲淹的岳阳楼感怀不源于此！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怀正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精髓。在孟子心中，人民最尊贵，他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甚至认为，只有得到人民拥戴，才可以做天子；若四境不治，可以“变置”国君。孟子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不仅当其时无人可及，就是此后两千多年，都是我国政治学说的高峰。贞观时期，唐太宗君臣推崇“舟水论”，其实也没有超出孟子的“仁政”思想。由此我想，中国几千年以来，在对“人”的认识上，很少有人超过孟子的水平。西汉初年，贾谊曾提出“民之为本”的主张，但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历史回响。一直到20世纪初，我国始终没有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写至此，忽然悟得清初大学者顾炎武针对当时郡县之弊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多年不得其解，认为顾炎武对“封建”之失和“郡县”之失看得都比较准，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出让郡县之官成为可世袭的“世官”？原来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孟子，提不出由人民做主来选择官员的主张，只能回过头来从“封建”之制中找办法，来弥补郡县制的不足。他认为只有把地方官变成有职有权可世世继承的世官，这些“官”才能尽心公事，才能矫郡县之制其失在“上”之弊，才能克服地方官不负责任、贪污腐败之痼疾，进而把一地之政建设好。顾炎武穷其一生，都在探索治天下的良法，然因其思想没有进步到“民主”一途，终使其提不出改造专制之制的根本办法，只能走回头路，提出不是办法的空办法。这也怪不得顾炎武，直到20世纪初，我们的思想不是也没有超出顾炎武多少吗？要知道顾炎武已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了。然而，顾炎武之时的西方诸国，却已开始迈上争取“民主”的大道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上拉开距离，从对人民之地位的认识和法治的体现上可以看得出来。从

“爱人”之仁思想到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的提出，我们的先人不费大力气就做到了，但从民本的仁政思想进步到民主的仁政思想，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

我的书斋最早取名“广居斋”，实是取其字义，奢望着有一天能有一个大书房；后来我把书房称为仁斋，一是说我已有了一个还算像个样的书房，同时也是认识到：仁也好、仁政也好，民本也好、民主也好，其所体现的思想都太重要了，于是想从中思索些治乱循环的道理。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在人中，治乱之替，循环之机，只能从人民在国家所处之地位中求之。20篇小文写下来，我更加确信，一个国家，只有当她的人民在制度上，亦即事实上居于主体地位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的坚如磐石，治了才不会再有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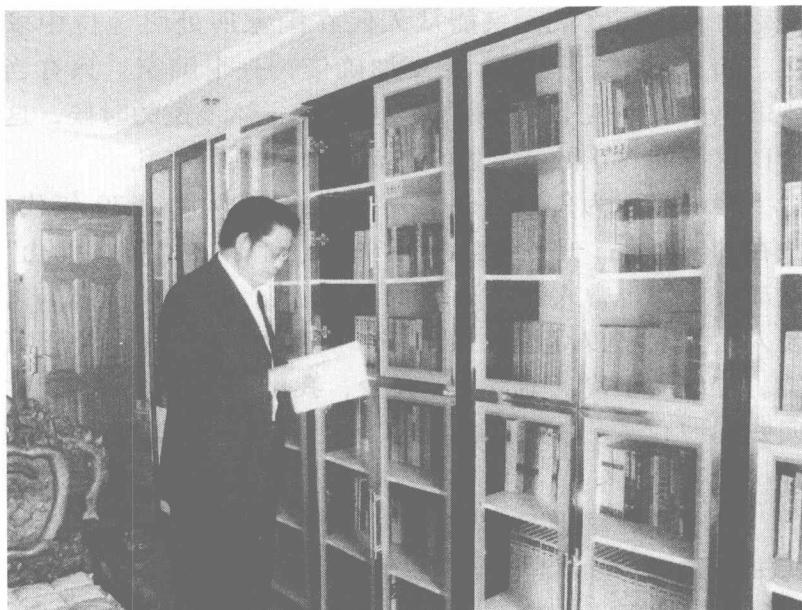
将书斋称为仁斋，还有一个想法，20世纪70年代，我在部队当兵，是连队的一名“理论骨干”。“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也曾人云亦云地批判孔子，说孔子的“仁者，爱人”是“吃人”。现在看来，真是少不更事，荒唐可笑。荒唐的年代，不荒唐的人少，我也曾经荒唐过。现在回归到“仁”，在我是回归了自性，在社会是回归了理性。

仁斋里的每册书，都是我30多年一本一本积累下的。买书、藏书、读书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三年多来，不甘赋闲，每于闲暇，静坐仁斋，回望千古，对话先贤。本书所述，除第一篇是讲我自年轻时从军以来的心路历程之外，其余19篇皆是与古圣先贤对话的心得。前人《治安策》、《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皆千古忧世之作，虽不敢期比古人，然问道之心相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凡天下之人皆有权责为其尽力。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已逾 30 年的祖国，亦以此期盼再过 30 年，我们的国家能在政治体制上转型成功，走上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

徐汝芳

2008 年 7 月 10 日



作者 摄于仁斋

目 录

自 序/1
一 心安何处/1
二 超越汉唐/15
三 跨越体制之山/45
四 风雨玫瑰/59
五 赢在制度/69
六 郡县新论/81
七 郡县再论/97
八 秦用客卿/107
九 李斯之叹/115
十 品茗胡适/127
十一 故宅千秋/139
十二 变不离宗/151
十三 不傍圣人/169
十四 上下求索/181
十五 梁袁事略/209
十六 明末三大儒/227
十七 大道相通/257
十八 仰望先秦/271
十九 崛起之望/285
二十 期许“二〇、四〇”/297
后 记/312

壹 · 心 安 何 处

岁月虽染华发，但我要让思想保持青春。退步向前，清静为道；仁斋虽小，海阔天空。

20来岁在北京当兵时，我曾对自己的人生做过这样一个规划：50岁之前从政，努力为社会做点实事；50岁之后做学问，有所述说，可谓“少年志远”。既立此志，此后，无论从军或返乡，也无论生活之路艰难或顺畅，积数十年，未尝废书，相信欲报国必得有知识、有本领才行。

谈及人生的第二项规划，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尚处于“文革”之时，学制破坏，在学校里很难学到真知识，走当兵之路就更难读上书了。不曾想此生有幸，我于1972年年底作为“特种兵”到北京卫戍区一师一团当了一名警卫战士。这个“一师”就是当年毛主席写《为人民服务》以作纪念的张思德所在的那个部队，此部队在旧时代或被称作“御林军”、“禁卫军”。执勤地点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那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统管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只是电视台尚不称“中央”，而是冠以“北京”。1972年元旦前到了



作者1974年摄于北京南礼
土路口，背景当时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大厦。

警卫之地，听老兵说这座广播大厦是 50 年代由苏联援建的，楼里楼外的 20 多个哨位都是周总理亲自确定的；还听说林彪企图夺权时，曾计划如何占领这座大厦。这些故事无形中增加了我们这些刚进城的新兵对这座大厦的神秘感。后来江青等人也曾策划如何用武力控制这座大厦。在那个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动荡岁月里，也难怪一国总理要关心到它的安全保卫，因为它是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发声最权威的喉舌。

这座大厦的六楼设有一个图书室，里面藏着许多书。来到广播局执勤不久，我便有幸享受这个图书馆的“特殊待遇”，可以自由借阅图书看，而连队的其他战士就很少有这个福气了。这大概是由于图书室管理人员看我这个小战士热爱读书而又诚实的缘故吧。那个年代，生活在乡间的孩子见过什么书啊，更别说读了。我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时去当兵的，这在那时的部队就属于高学历了。但在我记忆中，在那个“读书无用论”和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真正有价值的课外书只见过苏联哲学家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词典》和一本没有书皮，开篇就解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古诗词的书。后来才知道这是游国恩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有就是读过一些“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一类的小画书和那个时代流行的《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之类的小说。现在竟然能见到这么多摆满书架的古今中外书籍，真使我喜不自禁。此后，部队生活虽然紧张，但我坚持三几天时间看一本书，数年不变。这样，几年下来，倒也读了不少好书。史书类诸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现代史书如范文澜^①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之类；

文学类如屈原的赋、魏晋诗文、唐宋诗词之类；政治理论书、马恩列斯的书更是用功去读。这其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不管懂不懂只管读；西方哲学书，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也读。恩格斯有一本书叫做《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阅读这本书，曾给我带来了一个新兵很难获得的殊荣。记得1974年年中的时候，有一天，团里田政委到我所在的班检查学习，问我都读什么书，又问我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记得我先把这本书分为几个部分回答清楚，接着又把每个部分的大致内容作了回答。政委见我答得有条有理，对我大加赞扬。不久，连、营、团都宣传表扬我刻苦学习的先进事迹，有意思的是还把我刻苦读书的事迹画成幻灯片让战友们看。只是幻灯片中的我画得根本不像，看幻灯片时我的脸害羞得直发烧。这年年底，我因为读书刻苦被团部记三等功，并获得师部嘉奖。据说“文革”开始后，部队记功就很少搞了。我不因战功，而因读书获得记功，确属不多见。除上述几类书外，摩尔根^②的《古代社会》、达尔文^③的《物种起源》、魏格纳^④的《大陆漂移》、李四光^⑤的地质书、鲁迅的20来本单行本杂文也都在这时读过。那时当兵津贴比较低，第一年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是8元还是几元忘记了，为了省钱买书，我曾让家中给我把寄信的邮票寄来。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读书真是勤奋极了。在作于此时的一首《五言小述》诗中，我这样写道：“人各有一好，我好在灯下；省下三五分，积得块儿八；书店买本书，心甜乐哈哈；并非图欣赏，壮心为中华。”可谓是我此时读书生活的写照。读书成了我的乐趣，也成了我的抱负。白天训练之余

一有时间就读书，晚上也读，有时黎明即起，就着楼道灯光读，简直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直到今天我还感叹，中央广播事业局六楼图书室不是大学，但却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对我此生的影响我在当时就体认到了，我深知是它给了我知道和思想。后来，当我即将退伍返乡的时候，我曾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盆文竹和一封感谢信以作纪念。这么多年来，每次到北京出差路过南礼士路口，我都情不自禁向这座大厦，向大厦六楼注目，再注目，因为那是我一段真情、一段忘不掉的岁月所在。除借阅六楼图书室的书外，我还常到王府井书店、西单书店、月坛书店及琉璃厂古书店去看书，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步行到前门南边的一间小书屋租书看。

士兵就是士兵，士兵的职责就是拿枪，而我这样忘情地读书已经不适合继续做一名战士了，我也仿佛觉得部队的纪律、部队的束缚已经不利于我的自学读书和人生发展了。于是，当兵两年后，也就是在我获记三等功不久，正当在部队的前途似乎很有希望的时候，我却决定要离开部队。回想当年之我，书生意气，屈原、陆游那种忧国忧民之心特别浓重，总感到



作者 1974 年摄于中央广播

事业局院内

对天下国家有一种责任和道义，总想离开部队去广阔农村作一番社会考察，进而上大学读更多的书，增长更多的知识。只有这样，才是报效国家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正途。这种思想我都把它记在了当年的笔记里。几年前看到时，还深为当年小小 20 来岁有如此之抱负而自豪。本想在此将其记下来，然搜寻当年所记笔记，才发现不见了 3 本，其中就有记录这段心情的那一本，甚为可惜，好像丢了一件宝物似的。好在找到了当年写的一首《思归》诗，亦颇能反映当时的心境。诗之前的一段话这样说：“近年，国家的政治状况使我密切关注，祖国的前途牵着我的心飞向了广阔的天地。思来想去，遂成《送友人》一首：“闭目沉思心急焦，贾子欲试亢歌高。不信前途复宋辙，中华车轮岂能倒。心意早上重霄九，并天那容壮心豪。只盼返乡速且速，搏风击雨驾云涛。”落款时间是 1976 年 5 月 11 日。诗中的“宋辙”就是衰弱的宋朝。我那时正在读毕沅^⑥的《续资治通鉴》，总觉得宋朝是一个最无作为的朝代。看这诗，想当年青春之我，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大有 20 世纪初叶为民族前途忘我奋斗的热血青年的情怀。在这种心境下，我于 1977 年年初向连队首长写了一封要求数员的申请书。申请书交上去后，一位连首长骂我说，领导培养你，让你入党，给你记功，想不到你小子敢向党支部示威！我还记得在我写申请不久，连队开展了继续革命思想教育，好像我要求数员就是不愿革命似的。教育不教育，反正这年春天我又回到了阔别四个多年头的家乡。返乡原想更有利于实现抱负，但生活不等于理想。回想起来，从返乡到 1983 年的六七个年头，是我人生路途中经历的一段最长的苦闷期。有志青年常有的那种凌云之志和平凡乏味的生活环境刻刻都在折磨着我，歌德式的烦恼也

时时困扰着我。先是家遭不幸，父亲辞世，这种在未立之年而丧父的打击，更坚定了我独立奋斗、走好自己人生之路的决心。为走出农门，我参加了 1977 年的高考，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结果名落孙山。1978 年我再次参加考试，然因当了几年兵，数学知识忘了差不多，只考了极不光彩的 6.8 分，最后只上了一个小师范。两年后，师范毕业，先后在乡村教小学、中学，后又到县城教中学，任史、地教员。在这不随所愿的一段日子里，我曾时常躺在村庄之后的河滩里，望着清澈东去的流水，想着孔夫子的话“逝者如斯夫”，难道此生就像这流水一样无声无息地逝去吗？在这段逆境岁月里，没有良师，也没有益友能窥出我心中的苦闷，激我奋进、鼓舞我没有自曝自弃的是那些古代贤们，如司马迁、范仲淹、陆游、鲁迅等一批愈挫愈勇的心中偶像，是他们推着我把思想超然于现实，用心灵去思索那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这一至高命题。在北京生活几年，所读的书，所经历的事，使那时的我感到国家内斗不止，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也体认到，一部中国的过往史，一治一乱，治乱相循，时至今日还走不出困局。帝制虽然没有了，但现实的制度，芸芸众生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这千年兴衰的原因在哪里呢？悠久之中国如何才能走上万世太平的大道呢？一个几近潦倒的乡下青年满脑子在想着这样的洪荒大漠，不知者还真觉得不可思议且不安分呢。近来读钱穆^⑦老先生的书，知道钱先生在幼小的时候，也遇到了此一问题。钱先生说，他在读小学时，其同族钱伯圭老师一日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答是。伯圭先生于是教导他：“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

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习他们。”伯圭先生一番话，对钱先生震动很大。钱回忆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困扰了近 100 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上。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习，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钱穆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9 月版，第 45、46 页）溯之过往，凝思治乱之源者，岂止钱先生哉。那究天人之变的司马迁，论说长治久安的贾谊，明辨封建、郡县的柳宗元，穷竭半生写成《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积毕生心血作成《日知录》的顾炎武，以《明夷待访录》传世的黄宗羲，写下《通鉴论》、《宋论》名著的王夫之和那中国刚刚踏入 18 世纪门槛上书言弊政的洪亮吉，第一个揭起“自改革”旗帜的龚自珍，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君宪、共和诸名士，无一不在思索如何破解中国之治乱相循的魔圈。即如帝王者，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站在帝王的立场上，也在思索如何让江山不败，一世、二世传承下去。近世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奔走呼号数十年，亦是竞竞于此。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⑧的一次经典谈话，更是深触了此一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